

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发掘简报

陈胜前, 陈慧, 董哲, 杨宽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地处南北交汇的汉江中游北岸的二级阶地后部, 发掘面积500m², 出土石制品334件。出土物以一条砾石条带为中心分布, 砾石的大小特别适合制作砍砸器。石制品组合以砍砸器、手镐、薄刃斧为主, 大型石器与小型的石英质石器兼备, 部分石制品上有流水磨蚀痕迹。石制品组合中存在着类型不均衡的现象, 可能与流水搬运、重力迁移等后期改造过程有关, 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

关键词: 丹江口; 余嘴; 石制品; 旧石器时代早期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39 (2014) 01-0039-12

为配合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200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超荣带队调查并发现了湖北郧县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1, 2], 2009年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进行发掘, 发掘面积500m², 出土石制品334件。

1 发掘经过与方法

余嘴2号旧石器地点位于湖北省郧县安阳镇余嘴村, 地处汉江二级阶地后部, 海拔150~155m。距离汉江越远, 山势逐渐越高, 形成连绵不断的山脉。汉江从郧县城到余嘴村20余公里的区间包含若干宽谷与峡谷, 余嘴2号地点所在区域谷地的宽度约为2km。

该地点紧邻汉江北岸, 被当地人称为“赵家包”, 发掘时该地点为抛荒的耕地。在发掘区以西约50m的山梁上曾有一庙宇建筑, 文革中损毁。

发掘工作从2009年8月20日开始, 10月9日结束野外工作, 历时50余天。采用探方发掘法, 按照地层归属出土物, 同时结合旧石器考古田野发掘通常使用的水平发掘方式, 测量所有出土物的三维坐标。由于发掘区坡度较大, 紧贴汉江水面, 又正值汉江涨水季节(发掘期间水位上升近2m), 在布方过程中我们没有采用正南正北方向的探方布置, 而是按等高线方向进行, 目的是在水位上涨之前获得最大的发掘面积, 同时也为了出土更方便。第一期布5×5m探方10个, 方向北偏东45°, 编号分别为A1至A10。由于在A8与A9探方中发现砾石条带, 为了追溯其分布范围, 在A7、A8探方上部布置B3探方, A9、A10探方上部布置B4探方, 规格为10×10m探方; 又鉴于A3、A4探方发现石制品相对较丰富, 在其上部布置B1与B2两个5×5m的探方; 共计500m²(图1)。

收稿日期: 2012-07-30; 定稿日期: 2012-12-14

作者简介: 陈胜前(1972-), 男, 湖北省嘉鱼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

E-mail: csq@jlu.edu.cn

由于 2009 年秋季雨水偏多，汉江水位持续上涨，最早发掘的 A1 与 A2 探方位置最低，最深挖到近两米处（以最高处计算），探方持续渗水。待到第一批十个探方行将结束的时候，A1 探方几乎完全被淹没（图 2），原定全面揭露砾石条带的计划不得不放弃。最大发掘深度在 B3 探方，超过 2.5m；最浅在耕土淤泥层下，平均发掘深度约 1.5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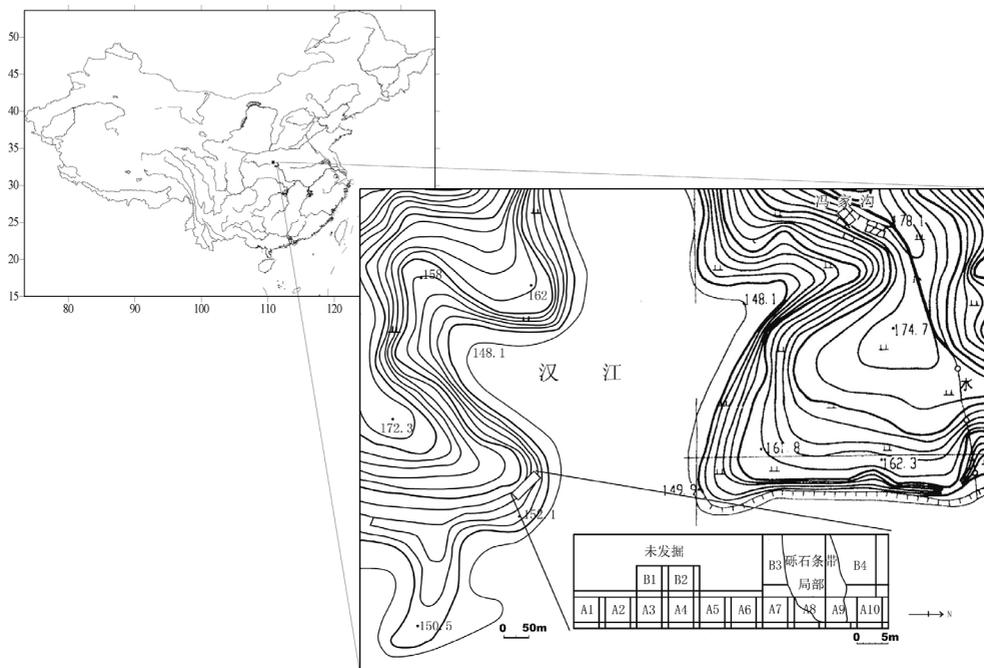


图 1 地形与发掘单位分布图

Fig.1 The topography and excavation units of the site



图 2 遗址发掘过程图（水面为丹江口水库）

Fig.2 Site excavation with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surrounding the site

2 地层与堆积过程

遗址的地层从上到下可以分为 4 层，具体特征如下（图 3）：

1) 表土层：所有探方都有分布。可以进一步分为耕土层与淤泥层 2 个亚层。上部没有发现淤泥层，虽然这一高度也曾在最高水位时被淹没过。B4 探方的东北侧为耕地的边缘，发现较多的石制品，为平整土地时扰动下伏文化层的结果。

2) 受过扰动的红黏土层：黄褐色，夹杂石制品与历史时期的砖块、瓦片。仅分布于从 A1 到 A5 五个探方，最厚处见于 A3 探方，厚度超过 1m。

3) 红黏土层：深红色，夹有砾石条带，分布于 A8、A9、B3 与 B4 探方。在 A9、A10 探方东侧发现一砂透镜体。砾石条带倾角 20°，倾向南偏西 12°，走向北偏西 55°。石制品主要发现于砾石条带的上部以及其西南侧，砾石密集的地方、砾石条带中与其下部都没有发现石制品。部分石制品存在磨圆现象。

4) 胶结坚硬的红色砂黏土层，见于 A10、B4 探方，无石制品出土。

从地层堆积来看，可能至少存在四次人类活动扰动过程。最早的扰动应该是古人本身；古人可能反复光顾此地，循环利用砾石条带的丰富石料资源制作石器。第二次扰动为坡面流水的搬运与磨蚀；有超过 4 成的石制品存在磨蚀痕迹。第三次是历史时期的干扰，第二层中旧石器与历史时期遗存共存。最晚的一次是近几十年当地农民在此开垦整平土地，由于坡度较陡，破坏到下面的部分文化层，B4 探方的第一层就是如此。

对地层堆积过程的分析表明，石器材料都来自于第三层，我们可以把第一与第二层出土的旧石器视为与第三层出土的旧石器同一时代的。

遗址周边调查显示，汉江北岸至少还有一个三级阶地，在北岸山梁顶部发现分布广泛的粉沙层、砂砾石层与砾石层。发掘区的砾石条带与之相关，都是汉江的搬运堆积，这个条带的延伸范围目前还不清楚，只看到砾石条带的局部。古人可能利用这一砾石条带来采集制作石器的原料（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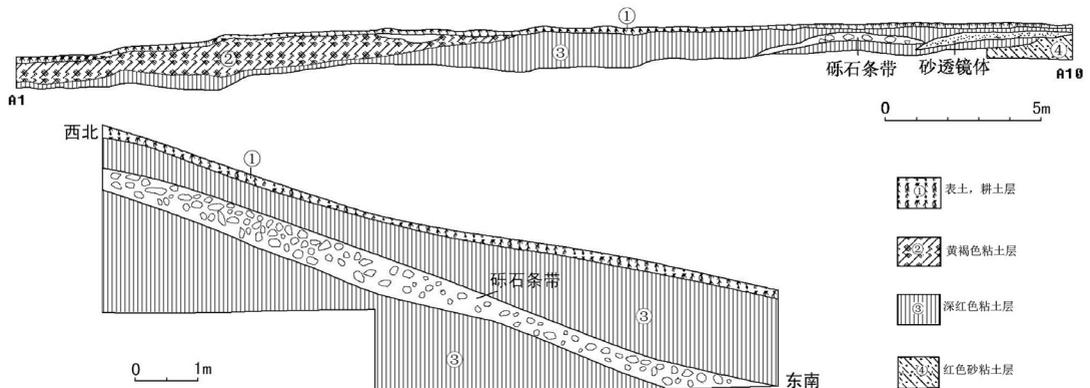


图 3 遗址的地层剖面图（上图为 A1-A10 西壁剖面图；下图为 B3 北壁剖面图）

Fig.3 The stratigraphic sections of the site (the upper is the west section from A1 to A10 excavation units; the lower is the north section of the B3 excavation unit)



图 4 砾石条带 / Fig.4 The gravel belt

3 石制品分类统计与描述

从原料的构成上来看,余嘴2号地点的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与角页岩为主(图5)。这些原料在砾石条带中都能找到,没有外来原料。也就是说古人就近利用原料制作石器。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在遗址周边调查中发现,砾石原料中存在燧石,质地不是很细腻,但是石制品中没有发现燧石的成分。砍砸器的实验显示这种原料很适合制作砍砸器,然而,古人没有利用这种原料,可能与其数量稀少有关,反过来,也反映砍砸器的石料选择以近便易得为原则^[3]。

从原料类型与石制品类型交叉统计来看,不同原料在不同石制品类型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表1)。刮削器、尖状器中没有角页岩,而是以石英为主,而砍砸器中则很少石英。这里的角页岩变质程度差异甚大,变质程度较差的角页岩不容易打制成适用于制作刮削器的石片毛坯。而石英坚硬质脆,缺乏韧性,在剧烈的砍砸活动中容易破碎断裂,不适合制作砍砸器。这说明古人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原料的不同性质进行合理利用。

石制品的构成以废品(包括断片、断块、碎屑与打片砾石)为主,真正的石器工具只占11%,石核与较完整的石片占10%(图6)。这种组合结构高于一般旧石器遗址的工具构成。在大多数遗址中,成型器物约占5%左右^[4]。余嘴2号地点较高的成品率可能与搬运埋藏有关,较小的碎屑已被搬运走。

余嘴2号地点的石制品组合体现一种砍砸器与石片石器兼重的特点。虽然在成型器物中块坯石器要占近三分之二,但是把所有石制品都考虑在内的话,石英石片与断片则占大多数。这与流行于长江中游的砾石工业传统有所不同^[5]。

余嘴 2 号地点的砍砸器以形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尖刃，另一种为直刃。前者以 B3 ③ :0270 为代表，把砾石一端加工出一个明显的带两个侧边刃的尖端。尖端与距尖端约 2cm 的侧边稍钝，另一侧有细疤。侧边刃的其余部分较为锋利，显示使用的部位主要在尖部（图 7：4）。直刃砍砸器以 B3 ③ :0040 为代表，石英砂岩质，整个刃缘长约 18cm。刃缘的中段较平直，两侧有明显的打击点凹缺，中段的刃缘较陡，有小的断坎，这部分刃缘长度约 6cm，这个部分可能是主要使用的刃缘（图 7：1）。砍砸器基本都是单面加工，在余嘴 2 号地点的材料中只观察到一例两面加工的情况。砍砸器实验研究显示一个这样大小的砍砸器实际可以使用的刃缘也就是在 6cm 左右。实验还表明单面加工能够获得更小的刃角，以及一侧光滑的砾石面，这个面可以减小砍伐时的摩擦阻力。A8 ③ :0040 标本的握持实验（即在使用右手的情况下，握持标本最稳定的姿态）表明砍砸时光滑砾石面是贴着加工对象的^[3]。砍砸器还可以按大小来划分，有 7 件重量不超过 500g，6 件处在 500~1000g 之间，其余 9 件超过 1000g，最重的砍砸器超过 2100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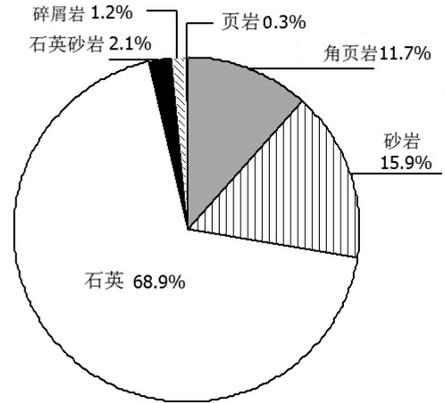


图 5 原料构成统计图

Fig.5 Lithic artifact raw materials

表 1 石制品类型与原料关系统计表

Tab.1 Frequency of lithic types and raw materials

类型	角页岩	砂岩	石英	石英砂岩	碎屑岩	页岩	总计
薄刃斧	0	2	0	0	0	0	2
打片砾石	1	2	6	1	1	1	11
断块	11	23	104	2	0	0	141
断片	6	20	36	1	0	0	63
刮削器	0	1	7	0	0	0	8
尖状器	0	0	3	0	0	0	3
砍砸器	15	3	1	3	3	0	22
石核	1	0	18	0	0	0	19
石片	4	0	9	0	0	0	17
手镐	1	0	0	0	0	0	2
碎屑	0	0	46	0	0	0	46
总计	39	53	230	7	4	1	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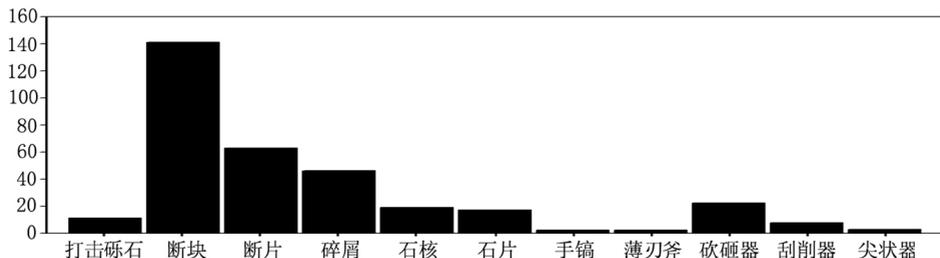


图 6 石制品分类统计图 /Fig.6 Classification of lithic artifacts

砍砸器直接利用河流砾石为毛坯，以保存状况良好的标本 A8 ③ :0040 号为例，其打击点集中清晰，半锥体的疤痕明显，显示出锤击法的特征。观察石片，以角页岩石片标本 B3 ③ :0183 号为例，同样可以看到明显的锤击法特征（图 7：2）。砍砸器实验表明，在砾石重量较大时，尤其是边缘较厚的时候，碰砧法要较锤击法更有效，不仅更好握持，力量更大，而且不需要消耗石锤，缺点是对打击点的控制不如锤击法好。就不同的原料而言，碰砧法对于石英岩、石英砂岩尤其适用，而对于砾石相对扁平的角页岩、砂岩不如锤击法好用。打击石英石片更需要用锤击法^[3]。余嘴 2 号地点的砍砸器原料以角页岩为主，古人选择锤击法是有理由的，不仅有利于剥离石片，而且有利于控制打击点的位置。基于以上的原因，古人选择了锤击法而不是碰砧法，虽然后者在制作砍砸器过程中更加便利。

薄刃斧 2 件，皆砂岩质。以标本 B3 ③ :0250 为例，大型石片为坯，长宽厚为 194×118×16.8mm，重 310g。一端有尖，稍残；另一端的侧后有明显的修理使用痕迹，刃缘长约 4cm（图 7：3）。

在石器工具中，手镐是有特色一个门类，它以砾石断块为毛坯，形态稳定成熟。余嘴 2 号地点出土两件手镐。标本 B3 ③ :0251 出土在文化层中，角页岩质，长宽厚为 146×67.5×45.4mm，重约 400g，尖部纤细，加工精致。两侧边中有一边疤痕重叠，已变钝（图 7：5）。标本 B4 ① :0198 出土于表土层中，为文化层被扰动的器物，表面风化痕迹明显，难以判断石质。长宽厚为 180×75.6×48.2mm，重 800g，尖部突出，一个侧边与后端加工成刃部。从手镐的形态与修理加工与使用痕迹来看，其用途除了可以使用尖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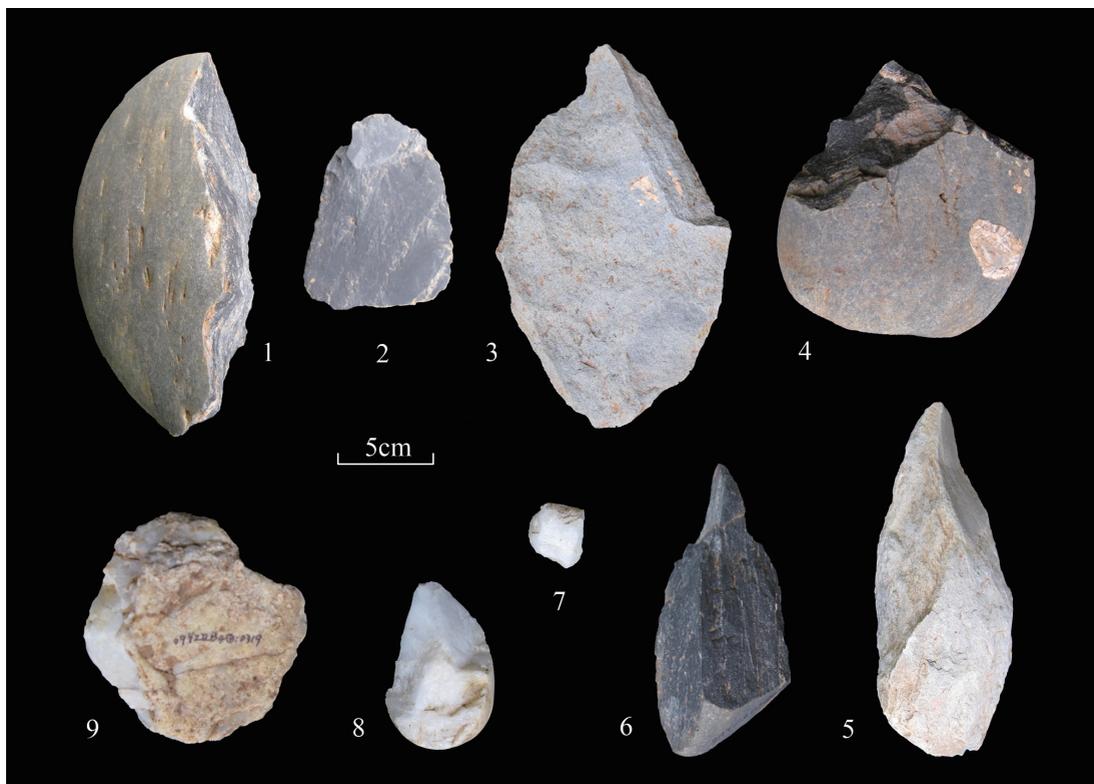


图 7 典型器物图 / Fig.7 Typical lithic artifacts

进行挖掘之外，还可能利用侧边进行砍砸，是多用途的工具，这也合乎旧石器时代石器一器多用的特点（图 7：6）。

刮削器 8 件，可以分为凹缺刮削器、直刃刮削器与端刃刮削器三种类型。除一件为砂岩质之外，其余皆为石英质。以标本 A4 ② :0008 为例，长约 4cm，两端向同一侧的方向有密密层层疤痕，显示出较大的使用强度（图 7：7）。

尖状器 3 件，皆出自 B4 探方表土层，为晚近时期平整土地扰动的堆积。以标本 B4 ① :0114 为例，石英质，以砾石为毛坯，从一端向四周打击形成尖部，片疤至少可以见到 5 个，尖端已稍残，与劈裂面相交的棱脊锋利（图 7：8）。

石核 19 件，除一件为角页岩质外，皆为石英质，以多台面石核为主。质地优良的石英石核更小，显示更大的利用程度。打击实验表明这样大小的石核基本到了最小的握持尺寸。而裂隙发育的石英石核明显尺寸更大，利用不充分。以标本 B4 ③ :0319 为例，是最大的一件石核，裂隙发育；单台面，台面边缘明显修理（图 7：9）。

完整石片 17 件，完整石片多见于初始打片的时候，打击特征保存比较完好。这些石片中，砂岩石片尺寸最大，角页岩石片次之，石英石片最小。

断块 141 件，石英数量居首，砂岩次之，然后是角页岩。就断块的大小而言，石英最小，角页岩与砂岩相差无几，但砂岩的变化范围更大，并且存在一些极大的断块（图 8）。

断片 63 件，质料的表现与断块一致。打制砍砸器与石英石核的实验表明，断片数量要远多于断块。遗址中断片数量少正表明存在流水搬运作用。

碎屑总计 110 件，长度不超过 1cm，全部为石英质，这可能与石英易碎但难以风化有关。

打片砾石 11 件，其上仅有一个片疤的砾石，可能为人工打击所致。

归纳起来说，余嘴 2 号旧石器地点的遗存特征如下：

1) 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与角页岩为主。原料在石制品所分布的砾石条带中都能找到，遗址附近亦常见，古人没有利用较为少见的燧石原料，反映古人以近便为原则的原料利用策略。同时，不同石制品的原料分析显示古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选择合适的原料，如刮削器、尖状器以石英为主，而砍砸器中很少石英。

2) 石制品的构成以废品为主，真正的石器工具占到 11%，超过大多数遗址中成型器物约占 5% 的比例。断块的数量要多于断片。部分石制品上有明显的磨蚀痕迹，这样的特征可能与搬运埋藏有关。

3) 打制技术以直接打击的锤击法为主，而没有选择同样适用制作砍砸器的碰砧法。

4) 石器工具组合中以砍砸器为主，兼有手镐、薄刃斧、刮削器与尖状器。砍砸器有尖刃与直刃两个类型。手镐的特点鲜明，不仅有修理的尖部，而且可见用于砍砸的边刃。刮削器与尖状器都为石英质，尺寸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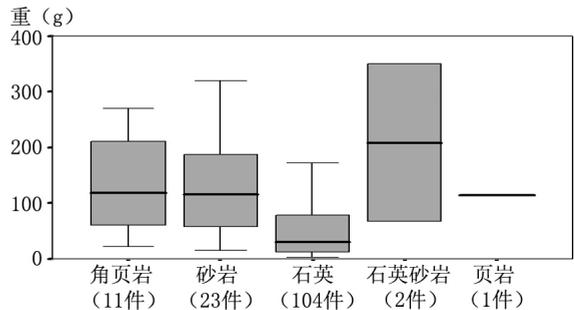


图 8 不同质地断块重量分布图
Fig.8 Weight distributions in non-flake
debitage according to raw materials

4 年代讨论

由于缺乏直接可以测年的材料,目前丹江口库区旧石器遗址基本都依赖遗址所在的阶地高度来断代。黄培华等根据野外地质特征认为“一般第一级阶地(高河漫滩)为全新世或全新世晚期的产物;第二级阶地,或第一级真正河流阶地常为全新世早期或晚更新世晚期形成;第三级阶地,在长江沿岸常为下蜀土阶地,高15m左右,常认为形成于晚更新世;第四级阶地,在长江沿岸常为红土阶地,作为中更新世产物…”^[6]。虽然古人一般濒水而居,但从现有的发现的来看,同一遗址可以有多个文化层,说明早晚不同时期的人类曾经利用同一级阶地,如龙口、北泰山庙2号、水牛洼、黄家窝等遗址;较晚阶段的遗址也可能位于高阶地上,如杜店(表2)。就余嘴2号地点而言,与其相距不到2km的余嘴村也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在50m²的范围内发现了上千件小型的石英质石制品,这个遗址海拔高度与余嘴2号地点一致。其石器组合特征与龙口、北泰山庙2号、水牛洼遗址上层一致,石制品以片坯为主,器形小,加工较为精致,年代应该晚于余嘴2号地点。所以,根据阶地高度来断定遗址的年代是不可靠的,阶地年代可以视为是人类活动最早年代的上限,晚期的人类活动范围更大,可能在高阶地上留下遗存。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可以比较肯定的是,丹江口库区存在两类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类是以石英质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的遗存,另一类是以砍砸器、手镐、(类)手斧¹⁾、薄刃斧(有学者称之为砍斫器)等以砾石原料制作石器为代表特征的遗存。在水牛洼、龙口、北泰山山庙2号遗址存在叠压关系。被归为中更新世的宋湾遗址是以中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同样位于三级阶地的杜店遗址也是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被归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缺乏断代材料,尚无法判明研究者的年代推测是否准确。但是,基于地层的叠压关系,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丹江口库区旧石器遗存存在早晚两个阶段:较早阶段以砾石工具为主,包含有手镐、(类)手斧等器物;较晚阶段则出现明显的石器小型化、石片化的趋势,以刮削器为主。

就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论,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明显的石器小型化与石片化,如果丹江口库区一带与这一趋势同步,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里较晚阶段的石器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较早阶段的遗存与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砾石砍砸器工业类似,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有数十万年,但目前从中还看不出明显的阶段性。有鉴于旧石器中期阶段难以定义^[18],不如统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余嘴2号地点的石器工业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同时由于它位于二级阶地后缘,手镐加工较为精致,它可能是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的产物。

1) 作者对丹江口库区发现手斧的说法保留个人看法,其形制与典型意义上的手斧并不一致,或可以称之为“类手斧”或原手斧。

5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遗址发掘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发掘之前，发掘者都会计划去研究一些问题，但是遗址发掘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发掘工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发掘者并不知道地表之下可能会遇到什么。因此，研究计划的实施必然会遭遇困难，计划去研究的材料根本就没有或是很难获得，倒是可能发现一些没有计划去研究的材料。新的发现往往会带来同样有意思的问题，这是发掘者特别值得注意的。余嘴 2 号地点的发现与发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石制品风格特征的问题。余嘴 2 号地点的石制品组合特征兼备砍砸器传统与石片工业的特征。传统上认为南方早中期旧石器工业以砍砸器为主，北方以石片为主。南方旧石器晚期石器工业在保留砍砸器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出现了燧石小工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余嘴 2 号地点具有南北石器风格混合的特征呢？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利用遗址周边以及地层中出土的石器原料开展了砍砸器的实验研究，进而质疑砍砸器作为一种技术传统的可能性^[3]。实验表明燧石、石英岩都比角页岩更适合制作砍砸器，地层砾石条带与遗址周边调查中都发现有燧石与石英岩砾石原料，只是不如角页岩常见。古人的原料以方便使用为原则，并不追求耐用；与此同时，砍砸器极为简单的制作策略也支持它更可能是一种即用即弃的工具，将之视为一种石器工业的标志并不合适。当然，与砍砸器伴生的器物如手镐、薄刃斧等，风格特征更为明显。所以，应该如何定义石器组合的风格特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 最佳原料带与人类适应问题。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类型。这种生计方式决定了他们需要丰富的石料来源与狩猎采集的空间。从一条河流的砾石大小构成来看，上游河谷的砾石无疑是最大的，下游的最小。砾石直径太大，根本无法加工；太小又不合用，因此就河流所能提供的砾石原料而言，存在一个最佳适合度。汉江中游的砾石大小正好满足这个要求。与此同时，上游河谷较为狭窄，山高林密，人类活动空间小。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河流泛滥，在人类没有掌握舟楫之前，也不方便利用。中游地区有一些开阔的谷地，便于人类狩猎采集。这样的分布特征也见于更加炎热的东南亚地区^[19]。我们有理由认为汉江中游的谷地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较为理想的生存地带。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可以用来解释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狩猎采集者麋集于河流中游的最佳原料带，后来逐步向下游发展^[20]。有关最佳原料带与人类适应关系的问题目前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更深入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3) 手镐的问题。观察我们发现的手镐，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手镐除了可以使用人工有意识加工出来的尖部之外，还可以使用侧面或是底端的刃部，我们所发现两件手镐上都存在双重功能的现象，这说明手镐除了用尖部挖掘之外，还可以用侧边或底边刃砍砸；另一现象是手镐的重量明显比砍砸器轻，而且与薄刃斧一起出土，是否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与考古材料研究。

4) 真假石器与石制品的分类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而实际远没有完全解决。后期

表 2 丹江口库区主要旧石器遗址地理位置、器物组合与推测年代
Tab.2 Major sites in the area of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including geographical positions, lithic assemblages and projected dates

遗址名称	地理位置	器物组合	研究者推测的年代
北泰山庙 ^[7]	汉江右岸三级基座阶地, 海拔143~155m	发掘800m ² , 石制品277件, 石器55件, 大型石器为主, 砍砸器和刮削器占80%, 石英岩为主要原料	中更新世早期
北泰山庙2号 ^[8]	汉江右岸三级阶地前缘, 海拔166m	发掘500m ² , 分上下两个文化层, 上层石制品21件, 以石英质小型工具为主, 下文化层48件, 石英原料为主, 有砍砸器、手镐、手斧等	上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晚期, 下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早期
彭家河 ^[9]	汉江右岸三级基座阶地, 海拔143~155m	发掘600m ² , 石制品184件, 石器25件, 大型石器为主, 14件为砍砸器, 8件为手镐, 石英岩、火成岩、石英砂岩居多	中更新世
宋湾 ^[10]	丹江右岸三级基座阶地, 149~160m	发掘800m ² , 石制品353件, 石器10件, 中小型为主, 刮削器5件, 砍砸器3件, 尖状器2件, 石英岩为主要原料	中更新世
杜店 ^[11]	汉江三级阶地前缘, I区海拔135m, II区145m	I区发掘400m ² , 第3层发现两处遗迹, 工具21件, 有刮削器、雕刻器等, 较精致。II区200m ²	旧石器时代晚期
龙口 ^[12]	汉江左岸三级基座阶地前缘, 海拔157m	发掘675m ² , 上下两个文化层, 上层石制品203件, 石英质小型工具为主, 下层43件, 有砍砸器、手斧、刮削器等, 砍砸器居多	上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晚期, 下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早期
水牛洼 ^[13]	汉江右岸三级阶地前缘, 海拔160m	发掘675m ² , 上下两个文化层, 上层石制品246件, 以刮削器为主; 下层55件, 有砍砸器、手斧等	上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晚期, 下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早期
刘湾 ^[14]	汉江左岸三级阶地, 海拔160m	发掘两个区700m ² , 石制品319件, 以砍砸器为主, 兼有手镐、手斧等, 脉石英、砂岩与硅质岩居多	距今10~5万年
黄家湾 ^[15]	汉江三级冲积阶地前缘, 海拔152m。	发掘200m ² , 石制品85件, 石英岩为主, 工具30件, 刮削器为主, 兼有砍砸器、手斧等	旧石器时代早期
伏龙观 ^[16]	汉江四级阶地, 高出汉江61m	石制品9件, 有手镐、砍砸器、刮削器, 原料有细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动物化石5目10科12种	早更新世晚期
黄家窝 ^[17]	汉江右岸二级阶地	三个文化层, 中层为主, 石制品500余件, 有手斧、手镐、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 脉石英与石英砂岩为主要原料	晚更新世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 距今20~15万年左右

的人工干扰、埋藏过程的水流冲击, 以及风化侵蚀等因素的加入导致对远古人类人工痕迹的判断存在不小的灰色空间。在发掘过程中, 我们同时做了大量的石器打制实验。我们发现针对不同岩性的石料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差异甚大。石英最耐风化, 但是大多数原料裂隙发育, 加之石英易脆, 断面形态差异较大, 典型的人工打片特性如半锥体、反射线、同心波等多不清晰, 这就给判断带来很大的麻烦。相对而言, 砂岩内部空隙大, 容易吸水, 因此也最容易风化。加之它由颗粒构成, 断面粗糙, 典型人工打片特征和石英一样不易鉴定。就石器工具而言, 典型的如手镐, 形态确定, 最容易识别。砍砸器大部分人工痕迹非常明显, 疤痕连续, 形态稳定, 但是一些砂岩质的“砍砸器”经过风化之后, 形态与真正的砍砸器非常相似。经过砍砸器的制作与使用实验之后, 我们认为砂岩根本就不适合制作砍砸器, 其刃部很容易崩落磨圆, 无法再使用。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制作砍砸器过程中的半成品与使用后损坏严重的标本, 这样的标本与自然因素破坏的标本不易区分。刮削器边刃常有修理的小片疤, 使用后刃部会有磨圆痕迹。薄刃斧也是如此。最难识别的可能要算尖状器, 由于其功能本身就多变, 目前的命名只是形态的描述。尖部的残损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工修理或使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6 总结

余嘴 2 号地点地处汉江中游，南北交汇地带，对于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代人类来说，这里具有石器原料丰富，大小合宜的优势。地形上山地与开阔地并存，适合人类生存。余嘴 2 号地点的石器的打制技术以直接锤击打击为特征，石器组合以砍砸器为主，兼有手镐、薄刃斧、刮削器与尖状器。制作砍砸器的原料多为角页岩，制作刮削器与尖状器则采用石英。其中砍砸器的制作原料选择以近便为原则，体现出即用即弃的特点；手镐的形态稳定，风格明显。通过年代石器组合特征与地层关系的比较，我们认为余嘴 2 号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

致谢：此次发掘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十堰市文化局、郧县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发掘队由吉林大学教师与研究生一行 5 人构成，陈胜前带队，成员有陈慧、李亚利、孙亚晶、董哲（参加前期的发掘）、马小飞（本科生，参加后期的整理工作），发掘期间还得到吉林大学考古队魏东、吴敬两位老师协助，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 [1] 李超荣, 冯兴无, 李浩. 1994 年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2009, 28 (4): 337-354
- [2] 李浩, 李超荣, 冯兴无. 2004 年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石制品 [J]. 人类学学报, 2012, 31 (2): 113-126
- [3] 陈慧, 陈胜前. 湖北郧县余嘴 2 号旧石器地点砍砸器的实验研究 [J]. 人类学学报, 2012, 31 (1): 1-10
- [4] Odell G. Lithic Analysis[M]. New York: Kluwer, 2004
- [5] 袁家荣. 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A]. 见: 吕遵谔编.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70-391
- [6] 黄培华, 李文森. 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地貌、第四纪埋藏地层和埋藏环境 [J]. 江汉考古, 1995, 4: 83-86
- [7] 周振宇, 高星, 王春雪. 丹江口北泰山庙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08, 27 (2): 95-110
- [8] 卢悦. 丹江口库区北泰山庙 2 号旧石器遗址的石器研究与讨论 [D].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2
- [9] 裴树文, 关莹, 高星. 丹江口库区彭家河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08, 27 (2): 95-110
- [10] 牛东伟, 马宁, 裴树文, 等. 丹江口库区宋湾旧石器地点发掘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12, 31 (1): 11-23
- [11] 刘扬, 贺存定, 陈全家, 等. 湖北丹江口杜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初探 [J]. 江汉考古, 2012 (1): 48-53
- [12] 王欢. 丹江口库区龙口旧石器遗址的石器研究与讨论 [D].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 [13] 陈晓颖. 丹江口库区水牛洼旧石器遗址的石器研究与讨论 [D].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 [14]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湖北郧县刘湾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J]. 江汉考古, 2012, (2): 3-11
- [15] 方启, 陈全家, 高霄旭. 黄家湾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1 (1): 29-35
- [16] 武仙竹, 周兴明, 王运输. 湖北郧县伏龙观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J]. 人类学学报, 2008, 27 (1): 33-37
- [17] 宋国定. 湖北郧县黄家窝旧石器地点考古发掘与收获 [N]. 中国文物报, 2011 年 12 月 30 日 4 版
- [18] 高星. 中国旧石器中期之探讨 [J]. 人类学学报, 1999, 18 (1): 1-16
- [19] Schepartz LA, Miller-Antonio S, Bakken DA. Upland resources and the Early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Southern China, Vietnam, Laos, Thailand and Burma [J]. World Archaeology, 2000, 32(1): 1-13
- [20] 陈胜前. 史前的现代化: 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研究 [M]. 科学出版社, 2014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Yuzui Paleolithic Locality 2, Yunxian County, Hubei Province

CHEN Shengqian, CHEN Hui, DONG Zhe, YANG Kuan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Yuzui Paleolithic Locality 2 is located in the back part of the second terrace, north bank of Middle Hanjiang River, which geographically interconnects with South and North China. This excavation unearthed 334 lithic artifacts in an area of 500 square meters. Water-polishing and an unbalanced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suggest that there was water transportation. Most of the lithic materials distributed along a belt of gravels, which have the optimal size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hoppers and chopping tools. The lithic assemblage includes large tools such as choppers (22 pieces), picks (2 pieces), and cleavers (2 pieces) as well as small quartz scrapers (8 pieces) and points (3 pieces). Raw materials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ncient hunter-gatherers knew the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used them to make different stone tools. Quartz was used to manufacture scrapers and points, while hornfels were used for choppers. Experimental research supports the idea that choppers are a kind of expedient tool, because of a simple manufacturing procedure and apparent lack of strategy in the choice of raw materials. Chert gravels are found near the site and in the layer in which lithic materials were discovered, this raw material was not utilized by ancient hunter-gatherers. Picks are an interesting multifunctional tools with an intentionally retouched point and an edge for chopping. Since there is lack of suitable materials for dating, most sites set their dates according to their position on terraces. That is, the higher terrace, the older the sites. In fact, even on the same terrace, there are sites with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which means ancient people of different periods left lithic materials. A dozen Paleolithic sites around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 altitude, and lithic assemblage. Now we can assuredly know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lithic industries in the area. One is earlier, characterized by chopper and chopping tools including picks, proto-handaxes, and cleavers, the other is later, characterized by small flake tools mostly made of quartz. This evidence coincides with lithic industries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zi valley. In the Danjiangkou area, the small flake industry probably belongs to the Upper Paleolithic, and the former in the Early Paleolithic. As there is not an obvious phase of Middle Paleolithic, the two-period scheme is adopted to define the dates of those sites. The date of Yuzui Locality 2 is known not earlier than the date of the second terrace of Hanjiang River, most likely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Early Paleolithic.

Key words: Yuzui; Stone artifact; Early Paleolithic